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方法论

邱海平

【摘要】关于《资本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人们首先强调的是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将《资本论》的方法和方法论具体地贯彻和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献中都有一些论述,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人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包括:关于“抽象力”、关于唯物辩证法与“有机体”、关于方法的“两条道路”问题、关于《资本论》排列范畴顺序的原则、关于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关于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关于内在观察法与外在观察法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 抽象法

【收稿日期】2018-06-15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8)06-0043-08

关于《资本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人们首先强调的是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将《资本论》的方法和方法论具体地贯彻和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对《资本论》的方法和方法论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献中都有一些论述,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人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的有关论述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认真研究和正确解读。

一、关于“抽象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

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①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较,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殊性。首先,一切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以自然为对象)还是社会科学(以社会为对象),都是为了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其次,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由于它们本身从来都不是天然地“纯而又纯的”,而是诸多不同性质的成分的混合物。因而,为了发现和揭示特定的规律,就必须对作为整体的自然或社会进行“分解”。于是,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成了各种门类,而且即使是某一门学科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必须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提纯”。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通过特定的手段(科学实验手段和工具,例如“显微镜”或“化学试剂”等),“人为地制造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和条件”,然后,反复地进行试验和观察,直到发现那些自然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一样,也需要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提纯”,并且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和条件”。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每天都活动着的社会本身,因而,也就不能通过任何物质的手段在实际上对研

^① 《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究的对象去进行“提纯”,当然更不可能在实际上将社会放进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之中。所以马克思说,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换句话说,人类对于社会自身的研究,依靠的是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具体来说,虽然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在实际上去分离社会的不同部分,但是根据对社会的观察和已有的理论思想成果,仍然可以在“思维”即人的头脑中通过“假设”来实现这一点。

这就是说,作为科学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相同的要求,但是,实现这一要求的途径或手段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一差异,正是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不相同的特点的根本原因。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之点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它总是会更多地受到研究者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正是人们往往把人文社会科学叫做“软科学”的原因。当然,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因而,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例如,正是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爱因斯坦与玻尔对于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存在了差异。以上论述表明,把“抽象力”或者“抽象法”当做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特有的“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应该说,“抽象力”是一切科学家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抽象法”也是一切科学必然使用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而苏联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卢森贝早就正确地指出过“抽象法”的普遍性及其限度。^①

在经济学研究中,一方面必须进行抽象,也就是必须通过“假设”将研究对象中的“杂质”或者“次要因素的影响”舍弃掉,同时,又要将研究的核心对象抽取出来;另一方面,究竟“舍弃”什么,“抽取”什么,却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这一点,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而且实际上受到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的重大影响。例如,对于马克思而言,由于商品是客观上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②,因此,在理论上,“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③。为了弄清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也就必须首先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于是,“商品”成为《资本论》的第一个范畴,并且也是最具抽象性的范畴。然而,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虽然也都运用了抽象法或抽象

力,但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都认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因而,在理论上,他们不仅总是愿意从最抽象的那些“假设”开始(例如从“鲁宾逊的孤岛”开始),而且他们愿意把实际上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那些范畴和理论看做具有“普适性”的永恒的真理。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而言,大量数学推导的引入,使这一点更加具有迷惑性。可见,科学必须进行抽象,但是,并非“抽象的”即是“科学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抽象”,而在于“怎样抽象”,什么才是“合理的抽象”,什么又是“不合理的抽象”。其中,正确把握抽象的“界限”或限度是关键。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严格地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④,虽然在一些地方也谈到了有关“生产一般”的内容(例如,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第一节“劳动过程”),但是那仅仅只是为了“避免重复”,而不是研究的落脚点,因而是一种“合理的抽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当做解释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一般依据,这种把“抽象的一般”直接当做“具体的特殊或个别”的做法,从方法论的角度就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讲的那个“经济人”,并不是通行于各种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和形态中的“一般的人”,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的人”在经济属性上的一种概括罢了。把古罗马的奴隶当做和当代美国资本家毫无二致的“经济人”,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可笑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经济人”假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抽象的、一般的认识水平上,也丝毫不能推进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了解与认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要认识事物的共性或一般特征,更重要的是必须认识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人也是一种动物”这样一个判断,对于任何成年人来说,即使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无助于推进人们对于人自身的更加具体的认识。

① [苏]卢森贝《〈资本论〉注释》,第1册,第35—36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②③④ 《资本论》,第1卷,第47、8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就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把资本家、雇佣工人、政府公务员等等一切社会成员都理解为没有任何区别的“经济人”,这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也是虚伪的。那么,就《资本论》而言,马克思在进行抽象的时候,他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呢?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唯物辩证法了。唯物辩证法规定了需要进行抽象的对象和范畴,也规定了抽象的界限和不同的层次。

首先,根据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确立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而,一切抽象以“资本主义”为边界,换句话说,凡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至少是首先必须予以舍弃。

其次,依据唯物辩证法,通过研究之后,马克思发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言,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细胞”,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因而,首先必须从商品的分析开始。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商品生产,货币与商品紧密相联,并且是和商品一样普遍、甚至更为普遍的现象。在依次研究“商品”和“货币”之后,然后再直接研究“资本”本身。这样,《资本论》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三层的逻辑结构,即:商品—货币—资本。由此可见,真正科学的“抽象”必然以特定的“具体”为前提和对象。离开了这一原则,用抽象来代替甚至取消具体,则抽象就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

二、关于唯物辩证法与“有机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对《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把《资本论》的方法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方法”或“分析的方法”是不正确的;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理解为“实在论”的、把叙述方法理解为“辩证法的”,也是不正确的。

第二,《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批判继承的结果。所谓“唯物”就是把一切观念或理念的东西,理解为“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不是相反,把人们的观念或理念理解为事物本身产生的原因。辩证法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对于一切事物总是从联系和运动的角度去理解,因而,“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世界观,从而也是一种方法论。马克思

是自觉地把唯物辩证法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人,也因此,马克思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

第三,“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这就是说,“研究”与“叙述”是完整的科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有区别的。研究阶段的内容是收集材料(即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探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由表及里,归纳与推理,分析与综合,发现因果关系和规律)——形成概念与判断(即命题或理论观点)。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也就是从具体(现象)上升到抽象(本质)的过程。叙述阶段的内容则是陈述事物本身的发展,并且用已经发现的规律去加以解释。由于在形式上,理论“外在地”表现为由一系列范畴或概念组成的一个体系,因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而实际上,由于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方法,所以,理论结构的“先验性”即“主观性”(也就是各范畴的排列看起来完全是由马克思自己人为地决定的)完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另外,如前所引,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过,“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②。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还说“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③

这两句话表明,马克思把社会看做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结晶体”。任何一个活的有机体,它的各个部分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从而表现为一个整体。正像一个活的人,不是手、胳膊、腿、头等各种器官的简单堆积一样,任何一个社会也不是各组成部分的机械相加。因此,在理论上,对于“社会有机体”的剖析,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只能运用辩证法。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来分析社会及其经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8、11—1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济运动,首先在方法上,就比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胜出一筹。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物理学”或“经济力学”。一方面,这为数学被大量引入经济学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所谓“现代经济学”离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越来越远,从而离真正的科学也越来越远。可以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徒有科学的外表与形式而全无科学的内容与实质。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虽然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有机体”,但决没有简单地照搬生物或生物有机体的演化规律,并以此来代替对于社会有机体所具有的独特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因为毕竟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与自然或生物有机体是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基于生物演化的生物学理论或定律,对于以社会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而言,顶多只具有“隐喻”或“类比”的意义。真理往前再多走一步,就会走向谬误。

三、关于方法的“两条道路”问题

撇开研究阶段的内容不说,在叙述过程中即安排已经形成的各个范畴的顺序时,马克思遵循的原则或方法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作过详细的论述。在“导言”中,马克思不仅系统总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与局限,而且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按照方法的成熟水平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7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一个阶段的特点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例如从人口、国家等开始,通过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些抽象的范畴或概念,例如分工、价值等。后一个阶段的特点正好与前一个阶段相反,它不是从“具体实在”开始,而是从已经形成的“抽象概念”开始,并用这些概念去理解和说明各个“具体的实在”。

马克思认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认为前一种方法就是错误的方法。因为没有前一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也就不能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且前述马克思关于研究与叙述两个阶段的内容表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

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必须从具体开始,也就是必须从研究现象开始,而不应该从“本质”或某些抽象的概念开始。不研究现象,所谓的本质从何而来呢?以为科学就是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就不需要研究现象,可以不注重对现象的观察,这纯粹是一种误解,甚至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任何事物的“本质”,其实是不可能离开现象而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存在脱离现象的什么本质。所谓本质,本来就是指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是肤浅的,但是,“只看本质不看现象”则更可能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了。

根据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的具体论述,大体可以把它们分别概括为“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样两个不同的形式。这里的“具体”,指的就是“客观实在”,即人们可以经验的现象;这里的“抽象”也就是指通过研究而形成的反映事物内在联系的那些范畴或概念。“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既然马克思明确表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那么毫无疑问,《资本论》也运用了这样一种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唯心辩证法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同样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但是,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的根本错误“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③在逻辑形式上,《资本论》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有相似的一面,即都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都是辩证法理论体系,以至于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根本无法弄懂《资本论》。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资本论》在方法上与黑格尔哲学对立的那一面,即“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④。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25,2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黑格尔运用“正—反—合”三段论,从逻辑学开始,再到自然哲学,最后到精神哲学,将整个世界、连同他自己的哲学本身,统统纳入了一个神秘的哲学体系。虽然他对于事物之间的联系与转化的揭示,在很多方面完全是主观的、随意的,但这不妨碍他是第一个天才的辩证法大师。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的外衣”,发现了其中的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同时又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哲学,这正是马克思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的深刻而坚实的哲学基础。

四、关于《资本论》排列范畴顺序的原则

贯彻辩证法,就必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叙述和展开理论体系。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逻辑的方法,才能够揭示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那么,不同的范畴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换句话说,当面对各种不同的范畴时,例如,国家、人口、交换、分工、价值、利润、土地所有权、价格、工资等等,依据什么来判断或决定哪一个是抽象的,哪一个又是具体的呢?能否按照这些概念或范畴所出现的历史顺序,或者“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它们的顺序呢?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这“是不行的,错误的”。那么又应该如何安排范畴的逻辑顺序呢?马克思说“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²²)(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①例如,土地所有权是先于资本存在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它不再占有主导地位,而是受资本的支配。再比如,商业资本是资本的第一个形态,但是,在一切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商业资本,而是产业资本。显然,只能用资本去说明土地所有权,也只能从产业资本出发去说明商业资本,而不能相反,完全按照这些范畴出现的历史次序来进行说明。在“导论”中,马克思对于上述安排范畴顺序的唯物主义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提出了一个

“分篇”计划:(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②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资本论》三大理论卷,实际上只是相当于这个“五篇计划”中的第(2)篇中的第一部分,即“资本”这一部分。而后面的所有内容并没有按计划完成。

同时,由于马克思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考虑这个五篇结构的,那么,毫无疑问,整个说来,《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计划中的属于“抽象”层次的内容。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与对待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关于唯物史观与《资本论》

除上述“导言”之外,马克思于1859年1月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序言”,也是马克思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的一部重要文献。在“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进行了经典的概括,并且指出,它们是“指导”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唯物史观虽然是唯物辩证法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来看,并不存在先创立一般的唯物辩证法,然后再将之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而创立唯物史观这样一个过程或顺序,而是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进而将其发展为更为普遍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围绕哲学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例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都是在马克思已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后的作品,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既要坚持唯物主义,也要坚持辩证法,只有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2、32—3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始终以自然作为永恒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不仅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同样存在着辩证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生产活动是人类主要的生活和实践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因而,人类社会的生产(广义的生产,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不仅决定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水平,而且人类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制约着人类自身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等其他各种关系。在人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人类社会利用和改造着自然,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永恒的自然基础和制约条件。在人类社会生产中,一方面存在着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生产力又体现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本身的结构即社会关系也会得到发展,并表现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即社会形态。由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是人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因而,根据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的不同,可以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或水平所决定的;而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等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是,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认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关系、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都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因而,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及其辩证关系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机制与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资本论》的创作,有着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观的“指导”下,马克思确立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为自己确立了明确的“研究目的”,即“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那么,什么是“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经济规律”一定是“社会的

经济运动规律”。因为所谓“社会”,也就是由所有的人组成的一个整体或集合。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必然是人的活动,从而也必然具有社会性。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却有着特定的含义。根据前面关于“研究对象”和“方法与方法论”的讨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力求研究所有的经济现象或问题,也没有打算揭示一切社会经济规律。马克思关心的核心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发展的?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与特点?它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核心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不仅决定了《资本论》研究什么,而且决定了如何研究,这就是:必须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性质或特点出发去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必然性;必须在物质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关系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本身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变化。由此可见,唯物史观为《资本论》提供了研究与分析的“理论框架”。因而,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资本论》。

六、关于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

《资本论》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辩证逻辑),因而,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它表现为由一系列理论范畴或概念的排列而形成的一种“逻辑体系”。《资本论》里虽然充满了各种关于历史的材料,但它本身仍然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而不是历史或经济史著作。并且如前所引,马克思明确地否定了按范畴出现的历史次序来安排它们在逻辑上的顺序的做法。然而,作为一部唯物主义作品,《资本论》与实际的历史之间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那么,《资本论》的“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作了具体的阐述“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

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恩格斯已经非常清晰地揭示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辩证关系,因而无需更多的解释。

七、关于内在观察法与外在观察法

自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抽象的范畴和理论概念出发,试图建立各种理论体系。但是,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他们在理论上最终都是不成功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辩证法,以致于无法理解通过“内在观察法”所得到的范畴与通过“外在观察法”所得到的现象或表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总是试图将它们直接等同起来,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理论矛盾,最终导致了理论体系的瓦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评论。

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中,亚当·斯密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斯密的著作中,同时存在着“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又把在竞争现象中

表面上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也就是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眼中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与上述内在联系并列地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式在斯密那里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②

斯密著作中存在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式”一直被他的后继者们所继承。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代表李嘉图,是第一个自觉地试图将内在观察法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力图将所有的经济范畴立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抽象的规定,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对立的根源。因此,“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方法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③对此,马克思通过考察李嘉图的所有具体理论上存在的缺陷与矛盾进行了论证与说明。概括起来说,李嘉图虽然有意识地坚持了“内在观察法”,但是,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只有通过范畴的不断转化、通过一系列理论上的“中介环节”,才可能正确揭示通过内在观察法得到的抽象规律与通过外在观察法得到的现象或表象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区别。一定意义上来说,李嘉图同样没有最终摆脱存在于斯密理论中的内在观察法与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瓦解以及他的理论不断被庸俗化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

关于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④。

科学的任务正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2—183,184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律。然而,不能认为科学只与“本质”有关,而与“现象”无关。把“本质”与“现象”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甚至容易导致唯心主义。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中,没有绝对脱离现象的所谓本质,这一点,早由德国工人哲学家狄茨根作过正确的阐述。因而,一些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不仅在于“揭示本质”,而且还必须“说明现象”。《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且全面地说明了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直接反映这些现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是如何产生的,也因此,《资本论》同时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的方法论的区别,仍然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运用的是唯物辩证法,因而,它能够将“内在观察”与“外在观察”辩证地统一起来;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继承了李嘉图体系解体之后的“庸俗经济学”的一贯的方法论特点,即彻底摈弃了“内在观察法”,完全满足于“外在观察法”,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上兜圈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根本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

八、结 论

上述《资本论》中所运用和体现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与方法的丰富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毫无疑问,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全面贯彻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就必须坚持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高度出发;坚持社会有机体的社会观;坚持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根本的方法论;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系确立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同时坚持立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

第二,抽象和抽象法是一切科学的共同方法和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科学运用抽象和抽象法;必须在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实际出发;在继承、借鉴和改造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范畴的基础上,努力提出一系列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的经济学理论,进而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三,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普照的光”;科学认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个别规律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

第四,科学认识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研究方法方法与叙述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关系,大力加强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学范畴和理论的研究过程,努力克服跳过或忽视研究过程直接进入叙述过程的错误方法,努力克服用叙述方法代替研究方法的错误认识,从而避免理论和理论体系上的照搬照抄和教条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和严谨的理论体系,而不是零散的理论认识的简单拼凑。

第五,在坚持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方法为指导的前提下,必须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论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事实上,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许多重大差别,从而要求我们在方法论和方法上也必须进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邱海平,湖北云梦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于尚艳;责任校对:于尚艳】

ABSTRACT

All the Real Things Are Universal——Colloquy of an Academic Seminar between Marion and Several Chinese Scholars

(by Jean-Luc Marion, JIA Jiang-hong, HUANG Zuo, et al)

Abstract: On 21 November 2017,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osted an academic seminar inviting Jean-Luc Mario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hinkers and philosophers in today's Europe and the academician of L'Institut de France, and six Chinese scholars, most of whom are the translators of Marion's works. Marion is a retired professor of 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 and an in-service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He became famous for the Trilogie of Descartes Research in his early days, then stunned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the Trilogie of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giving out his "offering" phenomenology, and meanwhile got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s in Christian Theology and Aesthetics. According to the fields of Marion's academic attainments, we have divided the seminar record into three parts as follow for the readers.

Forty-year Private Education in China

(by PAN Mao-yuan, WU Hua, WANG Wen-yuan, et al)

Abstract: Pan Maoyuan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non-antagonistic concepts of for-profit and public welfare, proposing that "mixed ownership" would be another way to gover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Wu Hua used a large number of data analysis to illustrate that private education was better than public educa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private education had more advantages than publ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equity, efficiency and selectivity. Wang Wenyuan pointed that private schools were more innovative and vital i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 in China by the rule of law", and mad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six aspects of the new law in the Party's leadership, classified school running, legal status, marketization,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of illegal school running. Li Shengbing analysed the three major issues faced by China's private education after the new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2), including the problems of motivation, position and level, pointing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ga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three issues. Shao Yunzhen carefully analysed the risks existing in the sort management of Chinese private education, and suggested effectively governing by improving legis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Key words: private education; forty years; for-profit education; nonprofit education

Marx, the Best Thinker of the Millennium

(by FANG Xing-qi)

Abstract: Marx critical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Germany,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ies of Hegel and Feuerbach, and formed a world outloo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us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ntire world history". Based on the new world view, Marx discovered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special movement law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Engels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quite enough for one person to make two discoveries like this in a lifetime, even only making one could already bring happines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se two discoveries that Marx's theory has a strong penetrating power for human history, a scientific foresigh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a guiding role for real socialist practice. Therefore, Marx was recognized as the best thinker of the millennium.

Key words: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s; two major discoveries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of *Das Kapital*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y QIU Hai-ping)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Das Kapital* o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we first emphasize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no doubt completely right. However, it is still a problem to be studied how the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of *Das Kapital* can be concretely implemented and reflected in the research and narration proces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lthough many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clude the discussions of the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of *Das Kapital*, people still have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ability of abstraction",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and "organisms", etc.

Key word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methodology;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means of abstraction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Logic for the New Era——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Karl Marx's *Das Kapital*

(by MA Yan, WANG Lin, YANG Han)

Abstract: The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re the unclear starting point, the vague main line of logic, and the in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logic in Karl Marx's *Das Kapital* which analyses the operation mode of capitalist,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the speci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China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using the evolution of speci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China as the main line of logic, and combining the six major interest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employee-employer interest relationship, capital-capit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capital-society interest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competitive ideologic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and ecologic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n the system was appli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logic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jor interest relationshi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Epochal Orientation and Way of "New Norma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by HU Qin-tai)

Abstract: "New Normal University" was put forward to advance the innov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transforming in our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which has become the new goal and new stage of teac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Normal education will be transformed to real teacher education if "New Norma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enriches its connotation constantly adjusting to the times. We should take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high moral values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and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as a priority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way of "New Norma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orient to market demand, find key areas and weak parts to release the constraints of teac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build the cohesion system, talent training sys-